

The Portrait of A Lady



一位女士的画像

[美国] 亨利·詹姆斯 著
项星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he Portrait of A Lady



一位女士的画像

[美国] 亨利·詹姆斯 著

项星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36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位女士的画像/(美)詹姆斯(James, H.)著;项星耀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8735-8

I. ①一… II. ①詹…②项…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675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常 虹

责任印制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74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735-8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是英语文学中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在美国纯文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先后为伊迪丝·华伦和威廉·福克纳等所效仿,被尊为一大大师,他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手法对现代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

以解放黑奴生产力为目标美国南北战争于一八六五年结束,从此开始了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重建时期。三十年后,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即跃居世界首位。这一时期的美国,资本迅速集中,各行业的“大王”们暴敛钱财、挥金如土,官场和商界贿赂公行、腐败成风,劳苦大众不甘屈辱而奋起反抗,西部的不毛之地一时似是遍地黄金……这一幅幅包罗万象的人生图画,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滋润着乡土文学、幽默讽刺文学、揭露黑幕运动等种种文学现象破土而出,一大批来自中西部的作家登上了文坛。美国文学史上的这一巅峰期的成就使之得以跻身于世界文学大国之列。而为这一时期奠定了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的则是一对挚友: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如果说前者以其文学评论和编辑的慧眼指导并提携了一批知名作家的话,那么后者则以其多产的精致深刻的作品影响了后代的小说创作。

亨利·詹姆斯生于一个条件优裕的家庭。祖父在美国独立后自爱尔兰移居新大陆,成为美国第一批百万富翁,为子孙留下了大笔家财。父亲老亨利·詹姆斯是宗教哲学家,交往的都是社会名流。他主张孩子们要在充分认识世界后再确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小亨利自幼不但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师的教育,而且经常随全家在欧洲旅游,进过多所学校,学会了多种语言。父亲的计划十分成功,在这四子一女的家庭中,哥哥威廉·詹姆斯成了著名的哲学家

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和意识流心理学的创始人,弟弟小亨利·詹姆斯则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学家。

亨利·詹姆斯后来曾经指出,小说家应该是“什么因素在他身上都要起作用”的人。他自幼就生长在优越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环境之中,又频频往返于大西洋两岸,对欧洲古老的文明由认识而景仰。在他决心从事文学创作之后,感到美国舞台不利于创造才能的发挥,而且也提供不出适当的写作题材,便移居欧洲。先是旅居巴黎,结识了屠格涅夫、福楼拜和莫泊桑等作家,后来定居伦敦,参与沃吉妮娅·吴尔夫夫妇组织的文学活动,同当时的众多知名作家过从甚密。一九一五年,他因不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中立态度,愤而加入英国籍,遂获英王颁发的勋章。翌年逝世后,骨灰运回美国安葬。

亨利·詹姆斯始终生活在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上流社会的狭小圈子里,形成了优雅细腻的写作风格。在他多达二十余卷的作品中,中长篇小说主要是描写欧美两种文化的冲突,具体地说,就是天真无知的美国人在老于世故的欧洲文明前的内心活动和性格发展。从成名作中篇小说《苔茜·密勒》(1879)到晚期的三部长篇小说《鸽翼》(1902)、《专使》(1903)和《金碗》(1904)无不如此。

亨利·詹姆斯在小说创作上主要师事霍桑、巴尔扎克和屠格涅夫。尤其在和屠格涅夫的交往中,他懂得了小说主要是写人物而不是写情节。显然,从情节到人物是小说的发展和提高,是摆脱了以情节取胜的通俗的初始阶段;而他提倡的从人物外在的音容笑貌和行为举止深入到内心的情感变化和思索体验,也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更本质地刻画人物。不过,詹姆斯的人物很少行动,总是在思考从目睹到的一切中所受到的“启示”和“暗示”,这种借人物的主观“角度”向四周观察的叙事法是他的一大创新,为后人大大推崇,但是用得滥,未免显得拖沓繁琐;至于他的人物对话则过于高雅,似乎都在兜圈子,不是卖弄自己的智慧,就是揣摩对方的弦外之音,因此他编写的一些剧本,搬上舞台后多不成功。

《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写于一八八一年,一向被视为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不但体现了他前期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没有后期作品中那些过分晦涩的缺点。

一八六九年他首次独自赴欧旅游,在英国时听说他心爱的表妹密尼·坦普尔去世,悲恸欲绝,竟终身不娶。十年后的春天,作家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旅居时,就是以其表妹为原型,从“一个特定的、引人入胜的少女的性格和形象”开始构思,以此为基础展开故事:一个天真又有主见的少女伊莎贝尔·阿切尔只身随姨妈杜歇夫人来到英国,住在姨父的花园山庄里。她先后拒绝了美国工厂主卡斯帕·戈德伍德和英国贵族沃伯顿勋爵的求婚。深深爱着她但为痼疾所困的表兄拉尔夫要求父亲留给她一大笔遗产,由此招来梅尔夫人的垂涎,诱使她嫁给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婚后她才发现丈夫的真面目和他同梅尔夫人的暧昧关系,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作家在这里为我们提供的是一条旅居欧洲的美国人的画廊:刚愎冷漠的姨妈,慷慨大度的姨父,冷静清醒的拉尔夫,执著豪爽的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诚挚直率的戈德伍德,长袖善舞的梅尔夫人,傲慢自私的奥斯蒙德,粗俗浅薄的格米尼伯爵夫人,热情稚气的爱德华·罗齐尔,纯洁善良的帕茜。他们由友谊、恋爱、婚姻和家庭关系联结在一起,成为在美国气质和欧洲文化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微妙环境中的种种典型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几位女性,都是强者。杜歇夫人不消说是要以自己的意志左右周围的一切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女记者亨利艾塔不但喜欢随意发表己见,而且谈起话来咄咄逼人——她和杜歇夫人无法融洽,是两强难以相容的结果,如果说到差别,无非是老夫人欧化较深,更多地表现为我行我素,置旁人于不顾;而年轻的女作家则要评头品足,把个人主张强加于人。梅尔夫人尽管蒙着高雅的面纱,靠处世圆滑周旋于上流社会之间,但不时流露出她是个欲望和野心从未得到满足的人。她曾痴恋过奥斯蒙德,只是因为对方目空一切又一事无成还想支配她的生活,才没有嫁他。但她出于原来的爱情,恐怕更是出于对帕茜成长的

关心,还是为他撮合了同富有的伊莎贝尔的婚姻。至于她对帕茜的母爱尤其是必须深藏在心的,事实上,正是她迫不及待地要为私生女儿安排美好婚姻的意图,最终暴露了她的隐私,使她被迫返回美国。奥斯蒙德的妹妹格米尼伯爵夫人虽然俗不可耐,但她涉及自己婚姻和名声的那些自白,何尝不在玩世不恭中伴随着痛苦的心声。这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和梅尔夫人一样念念不忘自己未遂的追求,她们生活中充满了失意,还要硬撑门面,实在是有苦难言——二人的差别不过是智愚之分,或者说,在接受欧洲文化的影响上,她只学到了皮毛,而梅尔夫人则领悟到了真谛。她们两人的相互攻讦,毋宁说成是美国式的粗率和欧洲式的狡猾之间的冲突。帕茜虽是修道院培养出来的少女,以谨听父命为最高准则,但在关于个人前途的婚姻大事上,也已露出独立自主的端倪,以她的年龄而论,将来未必不成长为一个强者。

当然,这一组群像都是主人公的陪衬。如果说她们的形象由于具备真实的心理依托而十分丰满,使我们难以简单地用好恶来归类的话,那么作家着意描绘的伊莎贝尔·阿切尔就益发形神兼备了。她本是一个自幼丧母、长而丧父、身无分文的纯真少女,只是因为聪明好学而十分自信。这位单靠书本认识世界的美国姑娘一来到欧洲,就竭力想在令人眼花缭乱又深不可测的生活漩涡中得出对人对事的独特见解。而她引为知己的表兄拉尔夫·杜歇虽然为人正直、思想深刻,却一向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在指导她步入社会时又过分尊重和相信她的判断,不肯也不敢把叵测的世事人心灌输给她,这就导致了她的婚姻上的失误。从她性格的发展来看,她自恃聪明、追求独立,才使她拒绝了广有钱财却缺乏教养的美国青年戈德伍德和有钱有势又有头脑的英国贵族沃伯顿勋爵的真诚求婚,并且在得到大批遗产后嫁给清高而贫困的奥斯蒙德。无论是她的纯真的朴实还是拉尔夫的养尊处优都使他们忽视了金钱的可怕的腐蚀力。拉尔夫劝父亲给她遗产,原以为可以让她不必为物质生活操劳,以便安心享受精神生活的乐趣,也隐含着让她拥有家产便可消除与沃伯顿勋爵成婚的心理障碍的目的。而她在成了富女之后,一心想着要帮助“甘于清贫”的奥斯蒙德,以致

别人的不同意见被她一概拒之门外。谁知正是这笔遗产坑害了她,覬觎她的钱财的人也正是利用了她个性中的自信和善良才得以欺骗了她。及至她发现丈夫那种“清高”不过是吃不着葡萄便说酸的假象,骨子里却狂妄到任何人都不看在眼里,恨不得主宰世界的阴暗内心后,已经后悔不及。但伊莎贝尔的个性决定了她不会公开自己的不幸,甚至还要以照顾帕茜乃至感化丈夫为己任,从而完成自信到自强加忍耐的发展,具备作者所推崇的高尚品性。尽管她对奥斯蒙德已深恶痛绝,但也不会学姨妈的样子不能容人(哪怕是好人),不过她也绝不会让帕茜重蹈自己的覆辙。很多评家喜欢猜测主人公下一步的去向,但只有按照作家为她安排下的性格发展的导向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一位女士的画像》之所以成为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是因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这本书都足以反映作家的特色。他不愧是“海洋两岸他那一代人的阐释者”(这是为他刻写的碑文),而他在结构和词句上所下的功夫也证明他“头脑精纯到没有任何概念能够干扰的地步”(这是托马斯·艾略特对他的评语)。

那些以情节取胜的小说或许可以令读者难以释卷,但一旦了解了结局就不必再看第二遍。而《一位女士的画像》却需要你仔细玩味,反复翻阅,读后掩卷深思,还想再从头重新读起。

胡 允 桓

1992. 10.

作者序

《一位女士的画像》与《罗德里克·赫德森》一样,是在佛罗伦萨开始写的,那是一八七九年春^①,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正如《罗德里克》和《美国人》那样,它也预订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于一八八〇年开始刊载。但它与前两部小说不同,还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在《麦克米伦杂志》^②上按月连载。我在两个国家同时连载作品,这时已接近尾声,那时英美两国的文学交流还处在变化不定的状况。这是一部很长的小说,我写它也花了很长时间,我记得,第二年我住在威尼斯的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仍在写这部作品。我在斯基阿沃尼海滨租了几间屋子,那是在楼上,房屋靠近通往圣扎卡里亚的航道。海边的生活,奇妙的礁湖,都呈现在我的眼前;威尼斯嘈杂的人声终日不断,飘进我的窗口。每逢我穷思苦想,无从下笔的时候,我便情不自禁走向窗前,眺望那蓝色海湾上往来不绝的船只,仿佛想从那里寻找合理的启示,寻找美好的词句,寻找我的故事中下一个恰当的转折,以及我的画面上下一条准确的线条。但是我记得相当清楚,这些焦急的祈求得到的回答,往往只是严峻的规诫:那些传奇性的历史地点在意大利国土上虽然比比皆是,但在它们本身不是作品的主要内容时,它们对艺术家的集中概括是很难有所补益的。它们本身包含着太多的生命,蕴藏着太多的意义,无法给他提供恰如其分的词句。它们往往使他脱离自己的小问题,沉浸在它们的大事件中,因此过不多久,他就会发现,指望它们来帮助他解决困难,无异于要求一支久经战斗的军

① 据一些研究亨利·詹姆斯的创作的人说,詹姆斯住在佛罗伦萨的时间是1880年春。

② 英国的一份杂志,亨利·詹姆斯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前面提到的《大西洋月刊》是美国的杂志。

队，替他抓一名少找了几文钱给他的小贩。

在重读本书时，有几页仿佛使我重又看到了那弯弯曲曲、参差不齐的辽阔的海岸线，那一幢幢色彩鲜明、带有阳台的高大楼房，那像起伏的波浪似的伛偻着脊背的一座座小桥，而桥上那些按照透视法缩小了的啪嗒啪嗒地走过的行人，则随着波浪在升起又落下。威尼斯的脚步声和威尼斯的叫卖声——它们不论从哪里发出，都会汇集成尖厉的呼啸声，掠过水面——又从窗口涌了进来，唤醒了旧日的印象，那些欢乐的感觉和千头万绪、无计可施的心情。那么，那种通常能引起幻想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偏偏无法满足想象力的特殊需要呢？我在那些美丽地方，一再回顾这个问题，始终感到不能理解。我想，实际情况是：在这种要求面前，它们呈现的东西太多，多得在这个场合使用不了。这样，人们终于发觉，自己的工作与周围的景物格格不入，不像在那些不好不坏的普通景物面前那么得心应手，因为在这些景物面前，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幻想来丰富它们。威尼斯这样的地方太骄傲了，不会接受这种施舍。威尼斯不需要施舍，它永远只是慷慨地赐予。我们可以靠它得益无穷，但必须不抱任何目的，或者完全听命于它，为它服役。很遗憾，这些回顾便是如此。然而总的说来，毫无疑问，一个人的作品，或者整个“文学成果”，还是会因此而得到益处。从长远来看，虚耗的注意力往往会发生奇妙的施肥作用。问题完全在于，这种注意力如何遭到哄骗，以致付之东流。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哄骗，也有行踪诡秘、不露声色的哄骗。我想，即使是一位巧夺天工的艺术家的单凭真诚朴实的信念，单凭热烈的期望，还不足以免遭它们的欺骗。

在这里试图回顾我的写作意图的萌芽时，我看应该说，我最早有的不是某个想入非非的“情节”——这是一个极坏的名称——也不是我的头脑中突然闪现了一系列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任何一个场面，那种可以凭自身的逻辑，不必编故事的人操心，立即进入行动，展开情节，或者以急行军的方式奔向终点的东西。我所有的只是一个人物，一个特定的、引人入胜的少女的性格和形象，一个“主题”通常所有的各个因素，当然还有背景等等，则都要建立在

这个基础上。我必须再次说明,回顾这整个发展过程,回顾这么一个人物怎样在我的想象中推动一切,我觉得,这是与那位少女本身,与她最光辉的时刻一样有趣的。那种发展的潜在力量,一粒种子要破土而出的必然趋势,蕴藏在心头的思想要尽可能向上生长,伸向阳光和空气,开出茂盛的花朵来的美好决心,正是小说家的艺术魅力所在。同样,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从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出发,回顾事物的亲切成长过程——追溯和重现它的每一个步伐和阶段,这种美好的可能性也是引人入胜的。我经常怀着眷恋的心情,回忆伊凡·屠格涅夫几年前讲过的一段话,那是他关于小说构思的一般渊源所作的经验之谈。对他说来,一部小说开始时,几乎总是先有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影子,他们在他的眼前浮动,像真的又像假的,并以各自的方式,按照各自的特点,祈求他的关心,引起他的兴趣,吁请他的同情。这样,在他眼中,他们像是 disponibles^①,可以遭逢各种命运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际遇;他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然而仍必须为他们寻找准确的关系,那种能完美地表现他们的关系;去想象、创造、选择和组合那些最有用、最足以说明这些人物的情境,他们最可能引起或感受的各种复杂状况。

“找到这些东西,也就是找到了我的‘故事’,”他说,“这就是我创作的途径。结果是我时常受到指责,说我缺乏足够的‘故事’。从我自己来说,我已有了我需要的一切——表现我的人物,展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便是我的全部要求。如果我对他们观察得久了,我就会看见他们走到一起来,看见他们固定在一个位置上,看见他们参与这一个或另一个活动,遭受这一个或另一个困难。他们的神态,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便构成了我对他们的叙述,而且始终不会越出我为他们划定的背景——对这一切我只得说,很遗憾,que cela manque souvent d'architecture^②。但我想,我宁可少一些结构,不愿多一些,如果结构会影响我所表现的真实的话。法国人当然对我感到不满足——

① 法文:空闲人员。

② 法文:那常常是缺乏结构的。

他们在这方面是富有天才的，因此表现得很出色，不过说实话，一个人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才能尽力而为。至于一个人无意之中得到的胚芽，它们本身的来历如何，那么正如你所问的，谁知道它们来自哪里呢？这件事说来话长，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才能回答。我们可以说的也许只是：它们来自天空的每一个部分，它们几乎存在于道路的每一个转角。它们堆积在那里，我们总是从这中间在寻找和挑选。它们是生活带来的——我的意思是说，生活在向前发展时，顺便把它们带给了我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外来的，是强加给我们的，是随着生活之流漂进我们心头的。固执己见的批评家常常为他的头脑所不能接受的主题喋喋不休，现在情况既然如此，他的争论就显得愚蠢无知了。他能够指出，它应该怎么样吗？可是他的任务主要就是指出这点。Il en serait bien embarrassé^①。啊，如果他能指出我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那是另一回事，那才是他尽了自己的本分。”我这位卓越的朋友最后说：“我把我的‘结构’给了他，这已经够了。”

这位杰出的天才就是这么说的。想起他的话，我感到欣慰，我感激他指出了一个孤立的角色，一个游离的人物，一个 disponible 的形象中包含的巨大潜力。它提高了我当时的认识，使我看到了想象力所具有的那种幸运的机能，懂得了如何使虚构的或遇见的一个、两个或几个人物发挥幼芽的作用和能力。我自己也是意识到我的人物比意识到他们的环境早得多——过早的考虑后者，偏爱后者，一般说来，我认为是本末倒置。我羡慕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可以先看到自己的故事，然后才发现故事中的人物，但我不想仿效他们，我很难想象，任何故事可以完全不需要人物的推动，我也很难想象，任何场面可以不必依靠处在这场面中的人物的性质，因而也是他们对这场面的态度，便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当时正在崛起的一些小说家中间，我知道有所谓如实描述的方法，根据这些方法，场面可以无须人物的支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仍相信。那位可敬的俄国作家的话是有价值的，它们向我证明，我不必

① 法文：他对此感到十分为难。

毫无根据地去作任何这种操练。另一些来自同一源泉的回声,也在我耳边回旋,我承认,它们的音量纵然不算太大,但却同样历久不衰。在这一切之后,为了实际运用,就不可能不对那个遭到蹂躏、歪曲、混淆的问题,即“主题”在小说中的客观价值以至如何评价它的问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很早就要求自己对这种价值作出准确的估计,从而把关于“不道德”主题和道德主题的无聊争论一笔勾销。我完全同意,衡量某一个主题的价值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个问题是一旦得到准确的回答,就可以统率其他一切的——一句话,它是否正当,是否确实,是否真诚,是否来自对生活的直接印象或观察?——但我认为,批评家从一开始就忽视各个领域的界线,各种术语的定义,提出主观的要求,这大多是不足为训的。在我的记忆中,我早年时期的气氛显示,它被那些无益的争论弄得一片黑暗——今天的不同只是我终于失去了耐性,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了。我想,就这一点而论,最有益和近似的真理应该是:一部艺术作品的“道德”意义如何,完全看它再现的真实生活多寡而定。这样,问题显然回到了艺术家的基本感受能力的类型和程度上来,这是产生他的主题的土壤。这土壤的性质和效力,它以恰如其分的鲜明和准确“培育”生活图像的能耐,便或强或弱地体现了作品中反映的道德价值。这一因素,换句话说,实际就是主题跟刻在头脑中的某种印象,跟某种真挚的体验,具有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但是,艺术家的个性笼罩着一切——它最终影响着作品的价值——这当然不是说,它不是一个千差万别、变化多端的因素;事实上,它在某一场合表现为丰富多彩的媒介,在另一场合却可能比较贫乏和隐蔽。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重大价值,它的力量不仅在于在严密保持那个形式的前提下,能表现个人和总的主题的各种不同关系,对生活的各种不同观点,反映和描摹事物的各种不同倾向——这是人与人(或者在一定的范围内,男人和女人)的状况不可能完全相同造成的——而且在于它具有丰富的潜力,对它的形式越是使用得充分,越是接近突破它的边缘,它的特点也越是鲜明突出。

总之，小说这幢大厦不是只有一个窗户，它有千千万万的窗户——它们的数目多得不可计算；它正面那堵巨大的墙上，按照各人观察的需要，或者个人意志的要求，开着不少窗户，有的已经打通，有的还在开凿。这些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窗洞，一起面对着人生的场景，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它们提供的报道，比我们设想的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它们充其量不过是窗户，是在一堵遮蔽着一切的墙上开的一些窟窿，它们高踞在上，彼此不相为谋；它们不是有铰链的门，可以直接通向生活。但它们有各自的标记，即在每个洞口都站着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一双眼睛，或者至少有一架望远镜作为观察的独特工具，保证使用它的人得到与别人不同的印象。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在观看同一表演，但一个人看到的多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少一些，一个人看到的是黑的，另一个人看到的是白的，一个人看到的大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小一些，一个人看到的粗糙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精致一些，如此等等。幸好对任何一事物说来，总有一双眼睛能看到它，总有一个窗户会对着它；我说“幸好”，是因为它们的视野之大是不可计算的。人生的场景广阔无垠，“选择主题”的机会也数不胜数。开的窗洞或者大，或者建有阳台，或者像一条裂缝，或者洞口低矮，这些便是“文学形式”，但它们不论个别或全体，如果没有驻在洞口的观察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艺术家的意识，便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告诉我这个艺术家是何等样人，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看到的是什么。从而我也能立即向你说明，他那无边的自由和他所提示的“道德”。

这一切都离题太远了，我要谈的只是，促使我写《画像》的最早的模糊动机，无非是我抓到了一个人物，至于这个人物我是从哪里得到的，就不在这里细说了。我只想说，我似乎整个儿掌握了它，这样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对我来说变得那么熟悉，而它的魅力却丝毫也没有减少；我感到焦急，痛苦，因为我看到它蠢蠢欲动，急于走进生活中来。这也就是说，我看到它在迎接它的命运——某一种命运，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命运，这还是个未知数，它有各种可能性。就这样，我有了一个鲜明的人物——说来奇怪，它

已那么鲜明,尽管它还没有着落,还没确定的环境,还没跟任何人发生接触,而这一切却是我们对一个人获得鲜明印象的主要条件。如果这个幻象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它怎么能鲜明呢?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主要依靠它有个固定的位置。毫无疑问,一个人如果能够做一件细致的、也许还是繁重的工作,记下他的想象力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就可以说明,在某一时刻,它发生了什么特殊变化,例如,他可以比较清楚地告诉你,在某一情况影响下,它可能采取(直接从生活中采取)哪一具体的、生动的形态或形式。于是你看到,这个人物已在这一程度上被置于一定的位置上——置于想象力中,想象力容纳了它,接待它,保护它,欣赏它,充分意识到它存在于黑暗的、拥挤的、杂乱的内心深处,正如善于利用寄存的珍品“牟取利益”的精美的珠宝古玩商,意识到有一件稀罕的小“物品”,已由一位没落的、神秘的贵妇人或者一名业余投机家放进他的柜子,只要用钥匙打开柜子的门,它就可以脱颖而出,显露光彩了。

我承认,这种比喻,对我在这里谈的那个特定的“价值”而言,未免过于美好了,那是一位年轻女性的形象,十分奇怪,它处在我的支配下,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在亲切的回忆看来,这情形是合适的,而我的虔诚心愿只是要为我的宝物物色一个恰当的安置地点。我提醒自己,一个买卖人有了一件精品,宁可不予“出售”,宁可把它无限期锁在柜子里,也不愿让它落入俗人之手,不论这人肯出多大价钱。有些经营这类形式、形象和珍宝的人,是具有这种高雅情趣的。然而,问题是这一小块基石,这一个向命运挑战的少女的形象,起先是《一位女士的画像》这幢大建筑物的全部材料。这是一幢又高又大的房子——至少在今天回顾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尽管如此,它仍得环绕着我这位年轻的少女建造起来,而她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从艺术上说,这也是我应该关心的范围,因为我承认,我又一次迷失在分析结构中。那么根据什么逻辑增长法,这个小小的“人物”,一个聪明而傲岸的少女的单薄影子,居然会满足各种必要的条件来构成一个主题呢?——确实,这种单薄性至少怎样才不致损害这一主题?天天有千百万骄傲的少

女,不论聪明的或不聪明的,在对抗着她们的命运,那么这对她们未来的命运究竟有什么影响,以致值得我们来为它呕心沥血?小说从它本身的性质来看,就是一种“费力的事”,是为某一件事费尽心机,它所采取的形式越大,所费的力气当然也越多。因此,很清楚,我所要做的,就是要为伊莎贝尔·阿切尔做一番费尽心机的安排。

我似乎还记得,我看到了这是一件费力的事,但同时我也承认,这问题有它的迷人之处。不论你有多少聪明才智,要解决这类问题,你立即会发现,它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令人惊异的是,每当我们展望世界的时候,我们便看到,伊莎贝尔·阿切尔们,甚至那些比她渺小得多的女子,都在坚决地、无所顾忌地要求在文学中得到体现。乔治·爱略特曾经卓越地指出:“人类的爱的财富,正是由这些弱女子在一代代传下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必然是重要的,正如在《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狄朗达》中,海蒂·索勒尔、玛吉·塔利佛、罗莎蒙德·文西、格温杜琳·哈莱思^①必然是重要的一样。她们理直气壮、神采奕奕地走进了作品,她们始终用自己的脚在走路,用自己的肺在呼吸。尽管这样,她们仍属于那一类人物,这类人物单凭自己一个人,是很难成为兴趣中心的。事实上,这是非常艰难的,因此许多熟练的艺术大师,如狄更斯和瓦尔特·司各特,以至基本上具有同样巧妙的写作技巧的史蒂文生,都宁可接触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有些作家回避这问题的方法,实在就是扬言这不值得他们去做。但是避而不谈并不能挽回他们的声誉;贬低一种价值,并不能成为对这种价值的鉴定,甚至不能成为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的证明,这对任何真理都是毫无益处的。从艺术上看,一个艺术家把一件事“讲得”尽可能坏,并不能掩盖他对这件事的糊涂认识。应该采取更好的办法,而最好的办法还是首先不要故步自封。

同时,关于莎士比亚和乔治·爱略特的作证,我们可以这么回

① 这里列举的都是乔治·爱略特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答：他们虽然承认他们的朱丽叶们、克莉奥佩特拉们、鲍细娅们^①（鲍细娅可以说就是聪明而骄傲的少女的典型和范例）的“重要性”，承认海蒂们、玛吉们、罗莎蒙德们、格温杜琳们的“重要性”，但这种承认是有条件的，他们在把这些弱者作为主题的主要支柱时，从没让她们单独来承担它的重量，正如剧作家们所说，在缺乏暗杀、战争或世界大变乱时，便用喜剧性的穿插和次要情节来弥补她们的不足。如果说她们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已达到了她们所能要求的程度，那么这是在其他许多人的协助下完成的，而这些人都是比她们强得多的男子，另外，他们每人又与其他许多人发生关系，这些关系对他们说来，又是与那个关系同样重要的。克莉奥佩特拉对安东尼是无限重要的，但他的同僚，他的敌人，罗马国家，以及面临的战争危机，也是异常重要的。鲍细娅对安东尼奥说来，对夏洛克说来，对摩洛哥王子说来，对那无数个觊觎她的王子说来，都是重要的，但这些人又有着其他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安东尼奥说来，显然，其中有夏洛克和巴沙尼奥，以及他那失事的货船和极端困难的处境。这一困难，事实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对鲍细娅也是重要的——虽然我们关心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关心鲍细娅。不论怎样，她之得到我们的关心，以及一切几乎都由此而引起这点，已足以证实我的论点，因为这个卓越的例子说明，在一个纯粹的少女身上存在着价值。（我说“纯粹的”少女，是因为我猜想，尽管莎士比亚感兴趣的也许主要是王子们的爱情，他还是没有让她为少女所作的最好的呼吁，建立在她高贵的社会地位上。）这是一个例子，说明要使乔治·爱略特的“弱女子”成为作品的中心，即使不是唯一的中心，至少也应成为最明确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面对着深刻的困难。

对一个真正醉心于艺术的作者说来，迎接深刻的困难，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去感受一种美好的鼓舞，哪怕这是一种痛苦，而真正有了这种感受，就会希望危险越大越好。在这种情况下，最值得他去

① 克莉奥佩特拉和鲍细娅分别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人公。